

对话

河南理工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游吟歌:

应支持地方行业高校走向一流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徐春浩

游吟歌,人如其名。她不仅在声乐、大学生美育上有很深的造诣,还有一副热心肠。多年来,她为河南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大学生就业创业以及教育公平等暴露出的问题积极奔走,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今年两会,她把焦点聚集到地方高校特色化发展上。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她说道:“在国家‘双一流’建设上应向地方行业高校倾斜,积极支持他们走向一流。”

给予地方高校更多的支持

《中国科学报》:长期以来,中国高校通过一系列重点建设推动发展。在您看来,我国的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在重点建设项目上存在哪些问题?

游吟歌:多年来,我国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当前的重点建设项目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与地方高校关系尚未完全理顺,职能部门越位缺位问题尚未很好解决;地方高校发展趋同化现象明显,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管理理念等方面趋同化现象严重;高校评价体系不完善,高校内涵发展缺乏科学的评价引导;资源分配不均衡,政府对地方高校的关注度不够。

《中国科学报》:针对地方高校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您认为下一步的发展之路在哪里?

游吟歌:中国未来全方位发展离不开行业高校的创新支撑,应鼓励地方行业高校抓住国家高校“双一流”建设战略机遇,走特色化、高水平发展之路,依据自身条件挖掘优势、找准定位、扬长避短。

希望国家给予地方行业高校更多关注,尤其是优势特色学科、高层次科研平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以便尽快提升行业高校发展实力。高校应该加强分类发展,建立地方高校分类建设与管理体系,完善地方高校的多元评价指标体系。



分类发展要“自下而上”

《中国科学报》:在特色化建设之路,您对地方高校的一个主张是分类发展建立地方高校分类建设与管理体系。那么,在分类发展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游吟歌:在建立地方高等教育分类体系的过程中,地方高校建设不单纯是“自上而下”,而是要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政府部门要自上而下地进行宏观分类与指导;地方大学要自下而上地自主选择发展类型。

在建立地方高等教育分类管理体系时要重点关注两个方面的要求:一要认识到地方经济

“
地方高校建设要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一要认识到地方经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二要关注各种特色大学的科学发展和合理定位。

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二要关注各种特色大学的科学发展和合理定位,使各类型大学能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分工协作意识与思维,依据自身内外的发展条件,找准自己的定位,扬长避短,办出适合自己发展的特色。

《中国科学报》:您提到完善地方高校的多元评价指标体系。为什么地方高校要建立多元评价指标体系?旨在解决什么问题?

游吟歌:高校评价体系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指挥棒”,对高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导、激励和监督作用,并直接影响到教育资源的配置。构建分类、多元、科学的高校评价体系,切实推进管办评分离,将进一步完善政府管理模式、

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规范和完善社会评价。

在我看来,改善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地方高校最大的作用在于: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对大学评价的最重要内容,通过分类评价推动高校分类发展,破解“千校一面”的局面,引导地方高校办出特色,以科学评价为基础,通过绩效拨款,引导地方高校内涵发展、提高质量。

支持地方行业高校与区域、行业“联姻”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解决地方高校的发展问题,还应作哪些配套改革?

游吟歌:简政放权,落实和扩大地方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一所好的大学一般都拥有较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的制度环境。政府应围绕《高等教育法》规定的七个方面的办学自主权,以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加强部门协同,确保放权到位;在加大放权力度的同时,探索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管理方式,更多地运用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拨款、信息服务等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贯彻落实了地方高校在这些方面的办学自主权,才能使大学正确地选择和把握其发展所需的自身类型和定位。

加大投入,实施地方高校特色发展扶持政策。当前地方高校发展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尤其是在学科建设方面,引进高层次学术人才、购置贵重科研仪器设备、开展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等均需要持续的大量资金投入作支撑,而政府财政拨款重点投向部分省部共建高校,其他地方高校的发展则缺乏财政资金支持。建议政府能够在引导地方高校分类发展的同时,加大投入力度,支持非省部共建的地方高校走高水平特色化发展之路。

《中国科学报》:除了上述的改革,在您看来,国家的重点支持应落在哪个层面上?

游吟歌:有特色才能奔一流、创一流。国家应支持地方行业高校与区域、行业“联姻”,帮助他们与社会、企业深度对接,充分发挥自身的特色与优势,积极参与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帮助企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整体战略。

作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六批高等教育管理培训的学员,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进行了为期21天的高等教育学习。这是我从教30年来,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学习高等教育管理的课程,收获很大。以下几点感受和建议:

Beckman 交叉研究中心及公共平台建设

Beckman 交叉研究中心是由美国著名生物医学方面企业家捐资建立的隶属于伊利诺伊大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机构。该研究机构四个科研重点方向为生物智能、整体成像、人际智能互动、分子和电子纳米结构。该中心的研究人员来自具有合作需求的不同院系。

该中心运作模式是提供大型公共仪器设备对全校开放,实行有偿服务。参观时,我和一名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到该中心担任技术支持的研究辅助人员进行了交流,他说该中心设备管理人员本身不要求发表论文,任务很明确,就是为学校基础研究提供技术上的支持,确保了设备运行的顺畅和资源的共享。

它给我的启示是:尽管国内一些高校成立了交叉研究院并开始运行,但其运行机制与 Beckman 交叉研究中心还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北航交叉研究院只是针对引进的人才从事研究工作,并没有服务和技术支持。那么,在未来的运行中,是否可以逐渐吸纳学校真正有学科交叉的人员到交叉研究院,开展强强合作?此外,能否逐渐增设对基础研究的支撑和服务,或建立一个为全校基础研究提供服务和支撑测试中心?

学生招生、培养过程和校友宣传

参观的几个学校都有荣誉校友墙和杰出校友的雕像,以不同的方式对取得成就的校友进行宣传,这是对后来的学生的一种激励和鞭策,也是对拟加盟该校的学生的一种吸引。

我国高校研究生招生时,过分强调生源来自“985工程”和“211工程”的比例。带着这个问题,我了解了美国录取研究生的有关事宜。我和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大学的朋友和做博士后的学生交流得知,录取学生面试十分重要,对于实验学科还兼有实验设计和动手操作,这样对拟录取者可以有相对较为全面而综合的了解。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挖掘人的潜能。因而,我们录取研究生应该重视候选人的综合素质和潜能,而不应该人为地按本科“985工程”和“211工程”来衡量取舍。目前的状况,有可能会把一部分非“985工程”和“211工程”学校的具有较大潜能的学生排除在外。我们的成效更应体现在如何把这些学生的潜力挖掘出来,把他们培养成和本校生源或“985工程”和“211工程”生源一样甚至更优秀的科研人才!

教育授课及教学质量的评价

国内高校的评价体系过分强调科研成果的权重,忽略了教学这个担任教授的必要条件。而使很大比例的教师不重视教学,尤其是研究生教学更是出现师生皆大欢喜,部分授课老师给全优成绩的情况。

问题的弊端在于教学环节缺少平时考核的积累,而仅靠期中/末考试成绩衡量学生学习成效;没有实行考教分离,教师自己授课、自己出题并批卷,这种状况不利于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考核,更不利于对学生是否掌握了大纲所要求的内容作出评价。

我建议,在各个试点学院建立科学、完善的教学质量评估机构;率先实行对学位课课程的考教分离工作,打好学生的基础,并逐步推广到专业课程;完善助教制度,发挥老教师的传承作用。

人才引进和现有人员的考核与晋级

美国大学引进人才的 Tenure track 制度值得我们借鉴。伊大引进教师主要是为了课程教学,而非单纯为了提升学校在某一科研领域的影响力。我们与国际的接轨应该是对国外没有正式教职位置的人员,引进时从 Assistant Professor 做起。学校可以先提供相对高的待遇和必要的前期支持,待引进人员在圆满完成签订了签订合同承担的教学、科研和学科服务等任务的前提下,再晋升职位。

目前,很多连课都没有上过的引进人才,直接获得教授岗位,真正希望他们去讲授课程时,尤其是全英语教学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我上不了!”让他们自己尴尬。

我认为,可以给新引进人才高的待遇,但不必马上给予教授的学衔。不然,过上5年,中国的教授在外国人看来将基本上没有含金量。如此拔苗助长的引进模式,不仅会造成教学质量的滑坡,且因少量人员的引入,影响了老教师的积极性。

美国大学对教授的要求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某一方面有侧重是可以,但另外两方面也很强,只有单方面强一般是不会晋升的。我建议晋升教授的决定性标准是必须符合教授的所必须承担的教学、科研及服务的三个职责。

现有人员和人才引进后的晋级标准

教师的国际交流是扩大视野的重要途径。目前,我们学校教师职称晋升要求有1年以上的出国经历,但如何实施值得商榷。学校层面对于出国进修应该确定一个基本标准。建议须首先在本岗位上至少满三年以上,且业绩评价良好,有望在近期内晋升者方可申请;经评议批准后,以学术访问的方式,出去交流学习一年。这样既可防止教师扎堆出国,保证教学工作的相对稳定和质量,又可有效地杜绝流于形式,浪费国家经费,甚少数人的不佳表现对学校和国家造成负面影响的现象。(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记者快评

课堂低头族,谁的“病态”
陈彬

近段时间,大学生上课玩手机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首先是媒体报道,重庆某高校为了让课堂低头族能认真听课,推行无手机课堂,上课时间不准玩手机。再者,有网友不久前也分享一张照片,某老师为了遏制学生玩手机分心的状况,特别在教室设“手机袋”保管手机。而在今年的两会上,贵州大学校长郑强更是直言,大学里学生上课玩微信是一种“病态”。

应该说,大学校园里的“低头族”早已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课堂上学生们只顾埋头于手机而影响讲课效果的报道也不在少数。一些人甚至也早就在疾呼,将手机清除出大学课堂。似乎手机已经成为提升了课堂教学质量的一大公害。

但是,即使我们将手机全部清除出课堂,就能保证学生们抬起头,紧盯住眼前的黑板吗?必须承认,低头族在校园的泛滥其实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大学阶段正值学生们精力最为充沛的时期,他们活跃、渴望交流,同时对新技术又充满好奇,而这些正是手机所具有的最大优势。

也就是说,在这场“手机”与“课堂”对

学生注意力的“争夺战”中,面对手机的优势,传统课堂缺乏互动性,以灌输为主的授课方式几乎没有胜算。此时,将手机清除出教室,当然可以起到“直接杀死对手”的效果,然而问题的根源依然没有解决,学生的注意力还会被别的事物所吸引。必须承认的是,在我们目前的大学课堂中,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授课的吸引力也许还比不上一本课外书。

上课玩手机,究竟是手机的病态、学生的病态,还是传统教学方法的病态?

笔者并不反对大学课堂中采取一些限制手机使用的方式,但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手机本身,而是我们的课堂缺乏对学生注意力的足够吸引。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思考的重点还应该放在如何增强课堂的互动性,如何给予学生更多他们感兴趣的前沿知识,如何利用多媒体给予他们立体的感受,等方面。简单地清除手机就如同筑坝拦洪,适当地做是可以的,但最终的解决方式依然是“疏”,而不是“堵”。

他们把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上升流动归

创新创业型大学 20 问

课堂低头族,谁的“病态”
陈彬

编者按:作为英国国家创新创业教育中心(NCCE,National Centre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Education)的特别顾问,Allan Gibb 教授曾在中小企业和创新发展领域工作了30余年,他致力于建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他的经验、兴趣和出版物涵盖了几乎所有领域,从教育的各个阶段创新文化的发展、开办公司、生存和发展,到大型企业重组和内部创业,再到对创新有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培训和发展。他曾到60多个国家工作,与许多国际组织有联系。他担任着许多国家政府以及欧盟的顾问。

Allan Gibb 教授设计和主导了多个

针对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领导力和师资培训项目,他提出了创新创业型大

学的概念,分为20个问题,我们将逐一

介绍,敬请关注。

第1问:对于大学来说,创新创业理念的挑战是什么?

答:“创新创业型”大学这一概念的核心争论点是如何诠释“创业理念”(Entrepreneurship Concept)以及与之相关的“创业”这个词的含义和用法。一些专家学者单单将创业解释为大学知识产权(特别是理工学科)的产业经营和商业化,因此将其与技术转移机构、孵化器和科技园区的创新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甚至被政府和国际化的机构(经合组织OECD)广为应用,将大学理解为技术革命的源泉和增长的动力所在。

然而,学术文献上阐明创新创业理念可在各种环境下广泛应用。这些概念在英国“创新型大学领导力培训项目”(EULP)中是这样应用的。

创新精神理念(The Enterprise Concept)关注“创业型人才和创新思维模式”的发展。创业型人才涉及个人技能、品质、行为能力和能动

力等与企业家等相关的因素,但是能在任何环境下得以应用(如社交、工作和休闲等)。这些品质中较为突出的有:直觉决策、自主能动、交流联络、主动执行、机会判定、创造性解决问题、战略性思维以及自我效能等能力。

“创新思维模式”不仅是在商业背景下“自己做老板”的概念,更是作为个体能够应对不可预知的外界环境以及运用创新方法实践、思考、感受、沟通、组织和学习的能力。

创业理念(The Entrepreneurship Concept)强调个人和创业技能、品质的应用,对于成立新公司或新事业,发展已有公司,设计新的创新机构(加强有效使用创业技能的能力)的思维方式。范围不仅局限于商业,还可应用于社会型企业、教育、卫生、非政府组织和公共组织(如大学和相关政府机关)。

栏目主持:张静(NCCE 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

域外传真

教育改革无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

吉米·道华德

英国一位致力于社会平等研究的专家表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改革对于整个英国社会流动方面没有起到任何促进或改善作用。相反,如今出身于较差家庭的年轻人在进入社会劳动力市场时,尽管他们自身素质已经有了显著提高,但是,相比于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他们可预期的前景并没有好多少。

牛津大学社会科学家约翰·戈德索普从事阶层研究,他的研究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社会阶层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主要因为一些本来就具有优势的家庭运用他们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优势保证了他们的下一代可以继续在社会各阶层中居于顶层。

历任政府都认为,促进人们接受教育是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有力武器,但新的发现对于现有主流观点是一种严肃的修正。“历任政府都声称要提高流动性,把教育政策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戈德索普表示,“然而,尽管教育一直在扩大规模并进行改革,但相对来说,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远低于他们的父辈、祖父辈。”

作为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名誉研究员,戈德索普创造了戈德索普量表,应用后成为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分类系统的一部分。而现在,他的演讲将帮助民众继续讨论英国的社会分裂。

政府的社会治理咨询专家、社会流动与儿童贫困委员会主席艾伦·米尔本则发出警告:“由于代际之间的不平等继续拉大,英国社会可能将永远割裂。”“认为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观点已经是盲目的。”他说,“我从小到大都被教育且相信这一点,如果你在学校很棒,那么生活也会是好的。不幸的是,现在有大量的数据表明,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

戈德索普的演讲可能会强化这一观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与损失厌恶的心理理论相一致的是,父母和他们的孩子现在更关注如何避免向下流动,而不是如何实现向上流动。”他说,“因此父母在得天独厚的阶级立场时,将会对任何教育系统的扩张或改革行为作出回应,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

的优势,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的孩子保持竞争优势。这种强大的要避免自身阶层向下跌落的动机联合起来,通常会形成对改革的强大阻力。”

如果情况变化,戈德索普认为政府必须专注于超越简单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这些新举措包括增加研发经费,改善该国的基础设施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有什么可以通过只调整教育政策来实现呢?改变肯定是有有限的。”戈德索普说,“把教育系统本身当作机会不平等的解决方案,是对教育系统的不必要的负担。更确切地说,要想解决问题,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才是必要的。”

(作者系《卫报》高等教育观察员,韩琨编译)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